

自媒体环境下的涉藏舆情现状及对策

王方钊

西藏大学 西藏拉萨 850000

摘要:在自媒体时代,西藏舆论环境更加复杂且出现了新特点:国外涉藏信息不时倒灌至国内;意见领袖在涉藏舆论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普通民众在涉藏舆情中的角色愈发活跃;两微一端等自媒体逐渐成为涉藏舆情传播的主要渠道;涉藏负面舆情呈现方式更加的隐蔽;涉藏舆情与其他四省藏区合流。然而自媒体环境下涉藏舆情监管仍存在着许多不足:网络舆情监管部门意识较弱;网络舆情监管部门联动不畅;网络舆情监管专业化建设不力;网络舆情监管法治建设力度不足;特殊环境下网络舆情监管内容日趋复杂。面对愈发紧迫的舆论环境,本文提出以下建议:更新监管理念,完善监管机制和组织体系;夯实舆情监管的法制基础,加强制度保障;科学应用监管技术,推进监管队伍专业化建设;结合藏区实际情况加强舆情监管。

关键词:涉藏舆情;自媒体环境;舆情监管策略

引言:

2020年9月12日,由中央网信办网络评论工作局指导,西藏自治区党委网信办主办、日喀则市委网信办承办的“新时代·边疆行—西藏篇”网评引导线下活动在日喀则市启动。本次活动是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策部署,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而开展的专题网评引导线下活动。活动充分展现党中央关于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在日喀则的成功实践,为加快推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由此可知,国家非常重视西藏地区的舆论引导工作。随着自媒体的发展,涉藏舆情在多方面呈现出较复杂的态势,因此本文基于西藏地区的现实情况,分析舆情的现状及舆论引导上的不足,从而提出涉藏舆情监管的针对性建议。

本文系2021年度武汉理工大学——西藏大学“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与高原科学研究共建创新基金”专项项目《西藏舆情与文化安全研究》最终成果。

项目编号: lzj2021012

2019年西藏大学“喜马拉雅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资金资助”(Supported by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Himalaya Regional Development)项目—《西藏舆情与文化安全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 ZFYJY201901010

作者简介:王方钊(1990.02-),男,汉族,四川成都人,研究生学历、博士,西藏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文学与文化传播。

一、自媒体环境下的涉藏舆情现状

1. 国内涉藏报道以正面为主

国内主流媒体对西藏的报道多以介绍性的正面报道为主,如西藏地区的重大节日、经济工作、历史文化等,其中相对负面的主要为极端自然灾害的损失。而涉及敏感问题的报道多以抨击国外反华势力为主调。在媒体设置议程之后,公众围绕该议题产生的观点、讨论被称为舆论,舆情则是舆论的总体特征。当公众面对不同议题时,其舆论焦点及特征均有所不同。在关于西藏地区重大节日、历史文化的讨论中,多数公众展现了对雪域风情的兴趣,同时多数人以旅游或休闲为目的关注相关信息,因此舆情的积极程度较高;对于西藏地区经济工作的讨论相对较少,讨论的内容多以没有实质性的发言为主,这是因为经济工作的专业性较强,评论经济工作的知识要求较高;公众对于极端自然灾害的关注较多,且舆情多以同情、捐赠为主;在敏感问题上,多数公众希望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团结。综上所述,国内媒体关于西藏地区报道引发的舆情大多较为积极,但同时媒体对西藏地区的关注较为片面,因而公众的讨论较为浅显。

2. 国外媒体涉藏报道以负面为主

国外媒体对西藏地区的报道通常以相关事件的发生为契机,如各国对西藏地区的人权报告、达赖集团的动向等。当美国发布西藏人权报告时,国外媒体便实时跟进并片面甚至歪曲事实的报道西藏的人权状况以达到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的目的。他国人权报告并不会站在客观的角度评价西藏地区的人权状况,亦不会报道在达赖

集团和旧西藏地方政府的统治下，西藏人民过着怎样水深火热的日子。多数国外媒体只会以西方国家的视角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无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这是极其傲慢且缺乏常识的。国外媒体针对西藏地区的负面舆论以抹黑中国政府为目的，配合西方国家的有关政治势力以推广普世价值为借口随意干涉他国内政，以此攫取政治利益。这些势力试图假借“平等”、“自由”等口号攫取其干涉中国内政的正当性。因此，国外媒体对西藏地区的报道通常是负面居多。

3. 国外涉藏信息不时倒灌至国内

国外媒体对西藏地区的报道一方面是面向国外民众的，这是因为国外普通民众对中国不熟悉，对西藏的认知更加陌生，因此这些国外媒体可以通过扭曲事实和片面报道，向受众群体传递有关西藏的负面信息，为干预中国内政和西藏事务造势，否则就会面对民众持续的反对抗议；另一方面国外媒体通过网络、媒体等平台向中国国内传递此类信息，以此蛊惑和干扰国内舆情。国内普通民众同样缺乏足够的判断能力，因此面对此类信息，民众也会被错误的舆论引导，对西藏产生错误的看法。当这类负面舆情形成时，政府部门不得不出面应对，浪费公共资源，影响地方群众的情绪和建设热情，对西藏的持续稳定和社会经济建设极为不利。因此，如何防止国外媒体编造的关于西藏的负面舆论倒灌国内进而影响国内的舆情，是涉藏舆情管理的重点。

4. 意见领袖在涉藏舆论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提升，年轻一代对国家的信任和期许更多，因而较为信任官方媒体的报道。但官方媒体的话语较为正式且通常代表一个组织或机构，因此民众难以对其产生亲近感。与此同时，舆论场中开始出现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他们能够对政治事件发表一些看法从而为民众提供新的思想，还能够介绍西藏地区情况以开阔民众视野。意见领袖通常以个人形象出现，而民众对个人的信任感远超过对组织或机构的信任，因此在舆论场中意见领袖的观点通常较容易被接受。同时个人的权威感较弱于组织的权威感，因而个人发布的观点通常能够引发更广泛和深度的讨论，而权威机构的信息发布通常会引发随声附和。如“喇荣五明佛学院大堪布”的微博经常发布西藏地区佛教文化相关信息，为民众了解西藏提供了新的渠道。此外，关于西藏地区的旅游信息较受民众欢迎，如“西藏旅游指南”、“西藏全攻略”等，它们一方面介绍了西藏的风土人情，另一方面为西藏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5. 普通民众在涉藏舆情中的角色愈发活跃

意见领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普通民众的关注和传播塑造了意见领袖，而意见领袖的观点影响了民众的思考路径，同时网络的发展使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意见领袖。因此，草根阶层既是生产舆论的大多数，又能通过发表真知灼见成为意见领袖。随着普通民众参加公共讨论的渠道越来越多，舆情也出现与以往较为不同的特征。以往的舆情通常由特定人群引发并传播，普通民众虽能根据报纸、电视等媒体了解特定人群的言论，但没有发表意见的媒体渠道。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民众能够在媒体平台上发表对社会、政治事件的言论。他们通过平台了解其他人的意见之后便倾向于认同他人观点，因而目前舆论场中虽比以往多元化但多数民众仍跟从他人意见。这并非沉默的螺旋现象，而是民众较缺乏思考能力的表现。然而网络媒体的发展同样催生了一批草根阶层的崛起，如西藏网红拉巴、哥次仁巴得了等，他们通过抖音、美拍等软件将对舞蹈、家乡的热爱传递给大家，使其它地区的人们能够从生活化的角度理解西藏社会。

6. 两微一端等自媒体逐渐成为涉藏舆情传播的主要渠道

舆论就是民众的言论，因而最能反映民众声音的媒体即是舆论的主要渠道。以往只有特定群体的小部分人才能够接触到报纸、电视等媒体，而现在无论是谁，即使是最普通的民众都能在微博、微信上发表言论，因此微博、微信逐渐成为反映舆情的晴雨表。移动新闻客户端目前已成为涉藏的主要舆论场，涉藏电子书籍、微视频和图片的评论栏中时常出现一些负面评论。自媒体的发达为民众表达意见提供了新渠道，但同时国外的Youtube、Facebook等网站为传播负面涉藏信息提供了方便，身处国外的反华势力经常以“解密”、“逃亡”等为噱头制造假新闻吸引关注，再通过模仿电视播报试图传递假新闻。当普通民众接触类似信息时，虽然会感到假新闻过于离奇且违背常识，但又会被其“揭秘真相”的口号吸引，此类虚假信息，对涉藏舆情的管理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同时制作和发布此类信息的人都会极力否认政府官方发布的任何信息，即只要官方有回应，他们就会再次捏造官方回应不可信的舆论，甚至可能利用官方的回应制造新的谎言。此类信息因其吸引眼球的标题和夸张的内容在自媒体上有极强的生命力，它们通常在海外注册并逐步渗透到我国互联网中，若遇到平台封禁便立即重新注册账号。因此，自媒体的发达既为涉藏舆情带来民众的新声音，又加剧了涉藏舆论战的激烈程度。

7. 涉藏负面舆情呈现出更多的隐蔽性

涉藏负面舆情较少在自媒体上大肆传播关于西藏政治的谣言，他们通常在管制较为宽松的其它国家媒体、网站或国内社交媒体内互相传递信息，并以多种形态的媒体信息吸引人们的关注。十四世达赖和境外反华势力采用线下和线上的传播方式，不再单纯依靠发放传单或反动书籍，而是通过网盘、电子书、文库等线上方式大肆传播涉藏舆论信息。此外，境外反华势力还专门开涉及西藏政治的软件和网游，甚至在网络售卖的商品中植入涉及西藏政治的音乐、视频等信息。同时境外反华势力还会利用藏族与其它民族文化的差异，传播其他民族不尊重藏族文化的信息，从而把普通的社会事件简化成专门针对西藏政治、宗教的问题。许多普通民众会在同情藏族同胞的感情驱使下为其发声，引发负面舆情，对西藏的持续稳定发展构成挑战。然而民众的善良却被无耻的境外反华势力利用。面对第一类信息，国家可以坚决地处理它，但目前境外反华势力多数处于他国且受政治保护，因而只能屏蔽类似信息而无法根除。而对于第二类信息，需要查证其背后的推动势力并公开相关信息。

8. 涉藏舆情与其他四省藏区合流

中国藏族群众生活区域广泛，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甘肃、青海四省和西藏自治区，其它地区的藏族群众逐渐融入当地社会生活且并不处于自治区内。由此形成云南藏区、四川藏区、甘肃藏区、青海藏区，而境外反华势力通常混淆上述藏区的概念，试图将“西藏”范畴扩大到整个藏区，这就导致有关其它四个藏区的信息也被境外反华势力利用以达到政治目的。根据2020年上半年数据统计可知，国外媒体对四川藏区的报道量最大，占48.13%；西藏地区的报道量位列第二，占23.84%；青海藏区的报道量位列第三，占16.77%；甘肃藏区的报道量占10.24%；云南藏区的舆情则较少。由此可知，国外媒体分不清西藏自治区和其它藏区，而此种做新闻报道的态度还常常被誉为新闻专业主义，国外新闻媒体在涉藏问题报道上的专业性由此可见一斑。同时境外反华势力为图谋更多的政治利益而故意混淆藏区概念，并向其它国家传递多地藏区的信息，因而目前国外媒体和境外反华势力口中的藏区包含了所有藏族民众生活的地区。他们利用此类信息蛊惑藏族民众，因而不利于藏族民众与国内其它地区民众的团结。

二、自媒体环境下涉藏舆情监管存在的不足

1. 网络舆情监管部门意识较弱

由于民众接收信息的渠道不断增多，其对政务信息的需求量也在逐渐增大，而我国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处于较落后的状态。在网络媒体盛行的前几年，政府一直受到多方面的猜疑和攻击。随着2003年全面建成新闻发言人制度之后舆论情况有所好转，但政府对舆情的处理仍较为盲目和被动。2008年发生几起较为重大的舆情事件后，我国政府认识到舆情的重要性，因而继续深化了发言人制度并开始着手舆情引导建设。但此时部分政府部门对舆情既轻视又惧怕，因此在这一阶段形成了以“删除”、“封禁”、“水军”为主的低效低质舆情引导手段。随着政府逐步扩大网上政务信息公开范围，多数民众逐步对政府及时公开的信息建立了信任，但仍有小部分民众持有对公权力的偏见。而西藏地区的政务信息公开服务相对落后，其首个政务微博“拉萨发布”在2013年才刚刚上线。同时由于西藏部分地区通信基础设施较为落后，该地区既难以接收到外界信息，也难以做到信息及时公开。

2. 网络舆情监管部门联动不畅

网络舆情工作主要涉及工信部、公安部、宣传部等多部门，然而在网络媒体刚刚兴起的时候，各部门还未明确具体的职责和义务。当发生负面舆情事件时，各部门仍遵循原本的规章制度而缺乏灵活性，经常出现任由事件发生却无法处理的状况。在2011年时，国家成立了网信办，它能够有效监督网络媒体。在一定程度上，网信办能够协调各部门间的关系，使它们相互配合从而完成网络监管的工作。目前，网信办协同多部门展开舆情监管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时宣传部指导新闻总署在网络上进行官方微博的维护，以此拉近与民众的关系并使民众能够及时获得政务信息。在舆情监管建设中，西藏成立了专门的互联网党工委，它承担着对网络媒体的监管责任。但在目前的实践中，党工委只注重对党组织内部和企业的监管，而较弱于网络媒体监管以及舆情监管。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仍需要找到各部门联合监管网络舆情的平衡点从而促进良好的网络生态。

3. 网络舆情监管专业化建设不力

在传统的政治环境中，政府虽然重视民众的舆论，但仍未完全意识到舆论的威力。而网络媒体的发达加强了舆论的力量，使它能够影响政府、国家的形象，因而舆情监管成为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然而网络舆情是近几年出现的新型社会现象，政府、学界等对其的认识仍在感性层面而缺乏深度的研究，同时关于舆情的研究通常只是阐述现象而较少分析其内在逻辑。因此，

目前的舆情监管通常是在网络上爬取相关文字数据，再运用挖掘技术对其进行情感分析、关联分析等，以确定舆情的走向和烈度。同时撰写相关舆情报告的工作人员通常并不具备哲学、社会学的视角，而只是根据数据结果分析最表层的原因。此外，工作人员还经常搞混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其撰写的报告仅是数据的堆砌。因此，在西藏地区的舆情监管建设中亟需投入更多资源以建设舆情系统，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选拔专业型人才，要懂得分析舆情数据，还应当对社会现象有深刻的认识。

4. 网络舆情监管的法治建设力度不足

网络媒体对西藏地区舆情的渗透速度远快于网络相关监管法规以及安全法规的建立速度，这是因为法规的建立需要基于对现实情况的考察。只有在了解网络媒体会对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以及网络犯罪的具体形式时，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法规。在充分的了解之前，只能根据原有的法律对现实情况进行灵活性地处理。目前，西藏自治区推出了《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办法》，该法规规定了通信基础设施的管理方法，而未涉及网络媒体、网络舆情。因此，西藏网络舆情监管缺乏系统的法律法规。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应对涉藏舆情的经验，部分宣传部门对负面信息的处理方法只有“删除”、“封禁”，殊不知越删越激起民众的怀疑反而增加了处理舆情的难度。因此，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以指导各部门工作，同时部门工作人员应明确“堵不如疏”的准则，尽量以正面信息取代负面信息。此外，政府部门应相信普通民众的信息辨别能力，相信在舆论场的锻炼中民众能够更理性地面对各种声音。

5. 特殊环境下网络舆情监管内容日趋复杂

近几年，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际形势变得更加复杂。我国的外部形势愈发严峻，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一直以知识产权保护等借口打击中国产品，妄图使我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这一背景下，若国内形势不稳定，我国将遭受更为严峻的考验。此外，国外媒体还借助西藏的特殊历史环境，向国内外民众传递不实信息。因媒体的特性使然，普通民众处于被动接受信息的地位，即民众无法第一时间查证信息的真实性，只能听信媒体传达的信息，这为无良媒体提供了天然的造谣土壤。同时媒体网络的覆盖面逐渐延伸，使每个人都有接触谣言的机会，这更增加了我国谣言治理的难度。而谣言的泛滥将给我国民族关系带来严峻的考验，煽动民族分裂，挑拨民族团结，离间民族关系，从而加大了民族治理难度。

三、自媒体环境下的涉藏舆情监管策略

1. 更新监管理念，完善监管机制和组织体系

涉藏舆情监管的主体是政府，因此政府应当首先转变工作理念，完善监管机制和组织体系。其一，政府应主动承担起舆情监管的责任。前文提及各部门由于职责不清而放任舆情发酵的现象，此类现象将会增加民众的不安感从而使社会陷入危机。因此政府应及时建立舆情监管小组，要求组内人员形成主动监管舆情的意识。在遇到涉藏负面信息时，由组内成员首先上报，之后制订应对舆情的相关方案。同时在舆情监管中应做到实时监管、重点监管，其中实时监管是指随时随地对舆情走向进行监控以防发生突发情况，重点监管是指对国外信息、特定渠道、特定人群进行重点监管。此外，监管小组还应主动学习先进技术并率先尝试政务信息公开的新渠道，从而及时抢占舆论高地。其二，细化各部门职责，做到覆盖全部涉藏舆情。目前，针对网络舆情的监管部门有网信办、互联网行业组织、工信部等，各部门有大致的职责范围，但在具体实践中经常出现无路投诉或无人管理的状况，因此各部门应联合办公以确认各自的职责范围，并分配无人监管的部分，最终做到权责分明、权责无交叉。在职责分配上，各部门应考虑本单位的性质以及其它工作范围，尽量做到舆情监管职责与其它工作不冲突且相辅相成。当出现网络涉藏负面舆情时，采用逐级上报和工作通报的方式，使各部门在第一时间能够掌握舆情目前状况并进行针对性地处理。其三，更新舆情应对机制。传统的“封禁”、“删帖”等舆情应对手段正受到各界人士的质疑，同时以堵为主的舆情监管非但无法解决民众对事件的信息需求，反而会造成负面舆情的泛滥。因此应以科学和积极的态度应对舆情，而非惧怕舆情。首先，在收集舆情时由监管部门对其划分等级。其次，对不同等级的舆情进行不同规模的处理。例如，坚决反击国外网络和媒体上歪曲事实的涉藏信息，而对国内民众涉及发布和传播涉及西藏负面舆情的，则依法依规，从轻原则来进行处理。同时在处理时要注意辨别有用心的信息以及科学性的讨论。最后，在处理权限的设置上要尽量谨慎。目前网上风传“县级宣传部能够封禁各种公众号”，由此可见舆情监管还未有严格的组织结构和相关规定，因此凡是机关部门都有权限处理舆情，这将极大影响监管部门处理舆情的效率以及民众的满意度。基于此，监管部门应成立专门的舆情应对小组，由小组对舆情做出科学的研判并对其进行处理。

2. 夯实舆情监管的法制基础，加强制度保障

多数国家已经建立相关网络法规以应对舆情，而我国在法治上暂时落后于其它国家，这是因为我国相较于发达国家网络发展起步较晚，同时社会冲突程度不及发达国家。近几年，我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它规定了网络信息安全、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网络运行安全等多方面内容。但其针对的管理对象多为信息、运营商、基础设施等，较少涉及网络舆情，因此应出台专门的舆情监管法律，使舆情监管部门有法可依。然而目前监管部门仅按照部门法规或治理逻辑对舆情进行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具备可推广性。法律的制订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明白法律的界限，因而能够更好地约束行为。其一，应推进舆情监管立法。由于观念的使然，网络上多数人对网络舆论立法持反对态度。然而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网络是现实的投射，应当具备与现实等同的法制约束，否则就可能因为少数人的自由而侵害多数人的利益。其二，应设立网络舆情信息公开制度。政府的服务对象是民众，因而应当从民众角度出发考虑舆情问题。民众并非无理取闹的乌合之众，对于公开的舆情信息他们能够判断其真伪。同时政府工作应该接受民众监督，如此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民众并从民众的反馈中汲取智慧从而完善工作中的缺陷。其三，实行后台网络实名制。虽然网络是现实的投射，但由于现实与网络的相对独立，以及网络中的关系无法对网民的所有行为进行有效反馈，因此网络中的个体很可能因为不受约束而做出不当行为。基于上述考虑，应建立后台实名制，使现实与网络进一步融合，使无法在网络中得到负面反馈的不当行为得到现实约束。在推行实名制的同时应注意保护民众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实名制信息对民众进行不法侵害。

3. 科学应用监管技术，推进监管队伍专业化建设

信息技术能够极大地提升舆情监管的效率，它能够快速定位舆情、跟踪舆情、研判舆情走向，因此监管部门应率先跟进技术发展从而提高舆情治理能力。其一，应建立舆情过滤系统。对于非常严重的舆情，应设置完全过滤。但各部门在判断何为非常严重上要尽量慎重，防止出现因“删帖”、“禁言”而引发的次生负面舆情。同时应当对信息进行后期过滤，以分析该舆情中的常用词从而建立舆情词库。在建立词库之后，监管部门能够据此对之后的舆情进行分析以研判其特点，从而制定出更有针对性的处理方法。其二，应建立舆情监管专业化队伍。在形成舆情监管组织的基础上，对组织中的队伍

进行优化。队伍中的成员需要至少掌握一种文本挖掘技术，能够对舆情特性进行分析。同时还需配备专门的社会学、哲学专家，他们将对文本挖掘后的数据进行深度分析，从而加深对舆情的认识。此外，还可以建立意见领袖队伍。在意见领袖队伍的建立中，应选取较为了解网络传播特点以及认同我国政治建设的人才。通过意见领袖的发言，政府能够向民众传达政府的部分工作，从而促进民众对政府舆情工作的理解。其三，应扶持藏区媒体。藏区网络建设水平不高，亟需加大人力、物力和资金投入，对藏区主流网络媒体进行重点扶持，让拥有大量人力、物力及专业信息处理能力的主流网站过滤网上每时每刻层出不穷的新闻和信息，担当互联网上的把关人角色。同时应妥善处理各媒体间的关系。传统媒体是传播信息的核心部门，而网络媒体是散播信息的重要部门，两者应相辅相成构建网络信息体系。

4. 结合藏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加强舆情监管

西藏自治区与我国内地主流社会有较多不同之处。在政治上，西藏从元朝就归属了中国，远比东北、内蒙归顺的时间要早。然而由于文化的差异和历史发展的原因，西藏的治理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一直处于较为独立的状态。在文化上，西藏群众多信奉藏传佛教，与中国社会主流文化大异其趣，而要使文化认同有差异的人们和谐相处只能寻求人最基本的共性。例如藏族同胞通常会认为人生就是修行或受苦，而信奉即是让自己解脱，不再在尘世的苦海中挣扎。而我国其他地区的民众则宗教信仰比较多元，有的群众的信仰或者认知可能与西藏群众认为的“人生就是修行或受苦，而信奉即是让自己解脱，不再在尘世的苦海中挣扎”相悖。因此在文化上，西藏群众的文化、社会认同与祖国内地存在多方面的差异。地理上的隔阂使内地民众缺乏对西藏的了解，也让西藏群众缺乏对其它地区的了解。同时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西藏地区受多种境外反华势力的侵扰，部分境外反华势力希望通过分裂西藏达到打击中国的目的，这使西藏成为舆论的争夺点。国外反华势力通过谣言向西藏民众塑造负面中国政府形象，而国内宣传又过于死板僵化，使政府一直处于被迫辟谣的状态。由此可知，西藏地区的舆情更加复杂，因而需要更有针对性的舆情引导和管理。其一，应加强西藏民众的文化教育与网络素养。根据教育局公布数据，西藏地区未上过学的居民占33%，小学学历占18%，初中学历占35%，高中学历占6%，大专及以上学历仅占8%。教育程度较低使多数西藏民众感受到与网络上其他人的差距，进而加大了对主流社会的

排斥感。因此，西藏政府需要通过提升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从而使他们了解网络的基本情况。在了解网络之后，西藏民众能够理性应对网络上的不同声音而降低被欺骗或利用的几率。其二，西藏政府应加强民生建设。由于西藏地区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殊情况，使得国外媒体能够利用其攻击中国政府。基于此，政府应为西藏民众提供更好的政务服务，同时大力发展经济以此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最终做到从源头上掐掉国外媒体借题发挥的机会。在经济建设中，西藏社会能够与主流社会有更多更密切的接触，因而能从侧面增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总之，涉藏舆情要从舆情形成的全过程进行针对性的处理，进而促成清明的网络环境。

参考文献：

- [1]相德宝.国际自媒体涉藏舆情及舆论斗争的规律、特征及引导策略[J].情报杂志,2016,35(05):20-26.
- [2]张丽君,黄明涛.边疆民族地区网络民族舆情治理探索——以“整体治理”理论为基础[J].广西民族研究,2019(01):54-64.
- [3]念兴昌.涉恐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规治——基于昆明“3·01”事件的思考[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20(03):146-154.
- [4]陈航行,王旭瑞.试论涉藏网络舆情的三个舆论场[J].西部学刊,2020(01):127-130.
- [5]袁哲,王洪飞.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治理的挑战与路径选择[J].科学社会主义,2020(01):94-98.
- [6]刘小三.“自媒体”环境下西藏地区的舆情呈现及其应对[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8(01):115-120.
- [7]张东,刘建辉.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引导研究——基于议程设置的视角[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0(02):80-86.
- [8]田世海,孙美琪,张家毓.基于贝叶斯网络的自媒体舆情反转预测[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9,42(02):127-133.
- [9]黎远宏.涉藏网络舆情监管与应对机制研究[D].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7.
- [10]刘艳,刘荣.基于场域理论的西方涉藏舆情应对策略[J].新闻知识,2020(01):28-31.
- [11]张涛甫.网络舆论生态的治理策略[J].新闻与写作,2016(07):22-25.
- [12]张涛甫.语境与肌理:公共舆论的理论解析[J].新闻与写作,2019(09):58-62.
- [13]张涛甫.当前舆论治理的瓶颈和突破路径[J].新闻与写作,2018(06):65-68.

